

语言：从逻辑到“游戏”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由文字、符号和字母交织起来的体系，极为抽象，一个实例也没有，甚至连常用哲学概念“对象”的实际所指，他也没有给出例子。他后来向学生解释说，作为逻辑学家，不必关心哪些对象是简单的，哪些是复杂的——那是由经验决定的事情。这本书关心逻辑形式，似乎与经验和生活无关。但维特根斯坦私下又对学生说，这本书在本质上是一本伦理学的书。当他在书中说“伦理学是超验的”，“不可能有伦理的命题”，意思不是说伦理不重要，相反，它对个人生活太重要，太贴近自我，以致只可意会，不能言述。维特根斯坦的最后结论因而是：“一个人对不能说的事情应该沉默。”

《逻辑哲学论》的人生意义不是用语言表述出来的，而是形象地显现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体验之中。比如，书中精心论证的“图式论”来自维特根斯坦的一次灵感。那时他在东线战场的战壕里看画报，读到巴黎法院在裁决汽车事故时常用玩具摆出事故前后可能事态的模型，维特根斯坦突然省悟到，命题如同模型那样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件，每个命题都是描述可能事态的图式，而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式。再比如，1925年他赋闲在维也纳家中时，为姐姐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公馆（现在是保加利亚驻奥地利大使馆），这座房屋结构给人简明精确感，有人说看似《逻辑哲学论》的数字结构。

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基于对《逻辑哲学论》的自我批判而形成。他在16年后写的《哲学研究》的序言中特别感谢两个剑桥同事：一个是曾经劝说他返回剑桥的逻辑学家拉默塞，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拉法。前者告诉他逻辑学的前沿问题，使他认识到《逻辑哲学论》远没有解决哲学和逻辑的基础问题。后者则在辩论中启发他。一次外出旅游，两人在火车上交谈，维特根斯坦说，命题与它所描述的事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斯拉法则付诸一笑，用手指在下巴上刮了一下，这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表示轻蔑的手势，他问道，这个东西的逻辑形式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别人，在斯拉法的批评面前，他好像是一根被砍光了枝叶的树干。

一些生活小插曲引发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反思。比如，他的“语言—游戏”说来自散步时看到的足球赛，他由此想到：人们的各种语言活动也是不同种类的游戏。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游戏”的游戏有很多种类，也许有人会认为，所有被称为“游戏”的活动一定有共同的特征或本质，否则不会被冠以共同的名称。维特根斯坦建议我们用观察的方法替代先入为主的想象，“你是不会看到所有游戏的共同点的，你只会看到相似之处和它们的联系，以及一系列关系。再说一遍：不要想，而要看！”语言活动也是如此，虽然它们都被称为“语言”，但它们没有一个共同特征，只有错综复杂、交叉重叠的相似性和相互联系。维特根斯坦把这种相似性称作“家族相似”，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家族的成员在身高、面貌、肤色、发型乃至性格、气质等方面有某些相似性，但所有家族成员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家族相似”的特征突破了传统逻辑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前者是对语言活动的观察、描述和概括，后者是对本质和属性的设想。“不要想，而要看”要求的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具体的语言用法出发认识事物特征。

维特根斯坦又把语言的用法比作一个工具箱，包括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煮胶锅、钉子、螺丝，等等。如果有人想出一个定义说“所有工具都是为了改变某些东西”，“但是，”维特根斯坦反问，“尺子、煮胶锅、钉子改变了什么呢？”把各种用法归于一类能够获得什么呢？为了获得对多种多样的用法的知识，就要观察，比如，火车头里有很多相似的手柄，为了知道这些手柄的用处，就要观察引擎曲柄的转动，开关手柄的位置，车闸手柄的推动，泵的手柄的跳动。

语词也是如此，只有知道它们在具体环境和活动中的用法，我们才能知道语词的意义，因此，“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语言的用法多种多样，不胜其数，但“语言—游戏”是遵守规则的活动。维特根斯坦说：“当我们遵守一种规则时，我别无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盲目”不是个人的主观任意，而是服从使用语言的社会规则，这些规则在长期的语言传统中形成，从咿呀学语开始就灌输给每一个人。如果说语言规则是约定俗成，那么“这不是意见上的协定，而是生活形式上的协定”。维特根斯坦早期认为逻辑形式决定语言意义，晚期强调生活形式决定语言意义，这个变化标志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从“语义学转向”走向“语用学转向”。